

四种视角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和边区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见

王彩霞

【提要】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21人到达延安,7月部分外国记者去晋西北等地继续访问。此后他们各自撰写了新闻、通讯和书籍等。记者们观察和议论比较集中的是民主政治、民生、社会生活、抗战形势等内容,从四种视角较为全面、立体、客观地体察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

【关键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国共产党 边区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4-0105-07

自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并出版《西行漫记》等作品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外国记者曾多次要求到延安访问,都被国民党拒绝。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前的阶段,英美等同盟国即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们希望了解八路军的战斗实力及敌后斗争状况,以便为第二战场的开辟等做准备。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说:“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①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传递边区及共产党的信息,以达到“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标。2月,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准许到延安访问。迫于种种压力,国民党被迫同意。

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行。记者团的

组成为:外国记者6人,代表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中国记者9人,代表《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领队和工作人员6人,共21人。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延安最大的一个新闻团体。中外记者团希望了解共产党各边区的施政纲领、生产、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参观人民代表机构以及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记者团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参观访问,先后参观了工厂、农场、报社、学校、医院、托儿所等,采访中共高层领导、国际友人、劳动英雄和各阶层人士,举行座谈会、参加群众集会。7月12日,中国记者及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部分外国记者前往晋西北等地继续参观。记者们在参观期间和结束后,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的集集成书。共产党的官方媒体也对参观团的行程及

^① 《朱副司令长官行署举行晚会,欢迎记者参观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2日。

内容等进行了报道。这些中外记者们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延安等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生活等状况。鉴于每位观察者的视角和关注点并不一致，本文主要选取了记者们着墨较多的民主政治、思想、民众生活、抗战形势等内容，同一件事情，记者们的想法可能全然不同。对于他们，可以大体看作是四种势力或四种视角在观察共产党及边区：第一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认识；第二方是代表国民党势力、不承认边区地位的记者的观察，以金东平及其所著的《延安见闻录》为代表；第三方是素有“第三方”之称的“中立”媒体，以《新民报》的赵超构和《大公报》的孔昭恺为代表；第四方即为外国记者。他们所观察的对象大体是一致的，但其表述和认知却各有不同。

一、民主政治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21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总方针，规定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具体政策。纲领确定了团结抗战的总方针和“三三制”、改善工农生活等具体实行政策。

对于共产党声称的“由下而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集中制”，《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诋毁说：由于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农村社会，一般农民的知识水平，当然比不上中共党员，所以，事实上中共的“民主”政治的“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少数中共党员服从多数民众，所谓的“由下而上”，也并不是民间的意见可以被中共采纳，这仅是透过中共的技术动作，使得一般人们不自知其被愚而已。中共的“民主”制度是口头为了人民，实际为了自己，使用少数的党员，去愚弄多数的民众，利用少数典型人物，压迫多数工农分子，在一切为了党的利益的原则下，立法、司法、行政都在党的支配下而行使其职

权。所以，“陕甘宁边区”内所实施的“民主”，便是透过民主中形式的独裁；“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便等于封建时代的君主的集权。^①他举例证明了中共的“愚民”手段：中共为了要增加税收，扩充实力，准备了“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人民”的金字招牌，由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起“生产运动”，来压榨人民。^②

《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从民生看民主：“与其谈民主等号召，不如先谈民生，因为这一百四十八万人口，九万九千方公里的地区还是个相当古老的农村社会。”^③孔昭恺列举了共产党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采取的变工手段、说服妇女人医院生育、采用“冬学”来办初级教育等，来说明中共自整风运动后，“它在边区政治上主要的作法，就是实际给老百姓解决问题。”“中共在争取民众上不是通过干部单纯的控制，实际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多少也是一个争取的原则。”^④对于“三三制”民选的领导的执政能力问题，孔昭恺注意到：民选的乡长、县长时常是农民出身一字不识的，乡政府里有文书，县政府里有秘书帮助乡长县长解决文字上的问题。在乡里，比较是单纯的农村问题多，不识字的乡长也许处理得了；在县里问题要复杂一些，这样一个县长能否应付，这实在是个问题。中共人士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⑤同时，他也注意到，“但是政府机关一般职员中，共产党人仍占多数”，原因是共产党解释为“由于战争环境的工作与生产条件”。^⑥

在延安期间，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代表会议

①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民族出版社印行，1945年再版，第90页。

②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第79~80页。

③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④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22页。

⑤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24页。

⑥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24页。

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来观察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如何运作。爱泼斯坦列述了他所考察的参会人员 22 人的职业和成份，“他们的成份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在抗日、改革和建设的旗帜下，团结本地区一切群体和阶级。”爱泼斯坦具体描述了一个老农民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县长（地主）的意见、穆斯林毛拉的反应、教育部副部长、前国民党民团首领现经商者的发言内容。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①

二、民生问题

关于边区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共产党“丰衣足食”的宣传，金东平客观上承认边区所取得的成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是认为这些成绩没有共产党宣传的那么夸张：现在陕北的工人和农民，大概每天都有着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他们所得的报酬，虽然仅是三餐小米，一套布衣，而他们工作的勤奋，却始终是不懈，也许，在他们的内心里，正深含着无限的悲苦和酸辛，可是，在共产党利用“抗日必需努力生产”的号召下，我们却从来不曾听到他们吐露半句怨言。……但是共产党要他们说“现在已经是丰衣足食了”，他们于是就毫不抗拒的一致点着头说：“我们已经是“丰衣足食”了”。^②

孔昭恺对于农民的生活这样表述：“在陕北，记者团所过的农村不少，可是与农民接触的机会不多，大体上看，农村生活情形是在进步之中。”^③

共产党在改善民生方面确实下了大力气，并且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即使是金东平，也承认了民众生活的改善，但他把民众当作是被统治阶层任意支配的“愚民”，是可以随意摆

布的被动的东西。而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民众是什么？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④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群众“丰衣足食”的程度还比较低，但如果了解边区百姓之前的生活，以及共产党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部队和政府面临的困难，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边区政府和群众对于民生成果如此振奋了。由于发展生产契合了老百姓的强烈需求，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对于中共的“三三制”和民主政治，国民党方面将其视为“封建时代的君主集权”，认为其完全是假借民主之名而已。倒是孔昭恺，认为谈民主“不如先谈民生”。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的事例，金东平主要意在揭示中共背后的“欺骗宣传”与“愚民手段”，孔昭恺则更多从老百姓得实惠的民生角度，而外国记者激动地发现了“全新的中国人”。

三、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

共产党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认为：延安的社会生活顶多样，顶活跃，集体生产和学习，特别是缤纷的各种各样的晚会，都是大后方所没有，所不能有的富有生气的群众性的社会生活。……在重庆，独裁、剥削、谣言和国民党的官儿阔佬们的糜烂的私生活的浊流，淹没了群众的正当的社会生活。^⑤

对于《解放日报》描述的富有生气的社会生活，金东平则看到的是延安的公职人员、士兵和学生单一枯燥且劳累的生活景象，学生不上课在纺纱，还改了四句木兰词加以说明：“唧

①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 页。

②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第 155 页。

③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 123 页。

④ 刘少奇：《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1939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3 页。

⑤ 《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的座谈会上抗议追悼活人及其他》，《解放日报》1944 年 6 月 28 日。

唧复唧唧，师生当户织，不闻读书声，但见纺纱急。”^①认为延安的生活单调寂寞。另外，对于自由活泼的民主环境，金东平也表示了质疑。他在重庆广播电台里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当时，我同周恩来说：“周先生是到过重庆的，重庆民众对于政府的批评，周先生也应该听到过，可是我们到了陕北以后，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批评政治好坏和中共的一切措施，人民当真的就没有一个不满吗？就是记者团和毛泽东先生谈天时，他也不会断然的承认。那么，人民为什么不讲呢？不用说，当然是由于“不敢”，中共是一天到晚在喊“民主”的，我想不到在中共“治下”的人民，竟然是这样的沉默。我虽然不敢说这是中共的“不民主”所使然，而民主自由活泼空气的养成，中共似乎是仍要加点努力。”^②张文伯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央广播电台做了题为《延安观感》的广播演讲，也指出延安生活以服从为准则。

福尔曼注意到：为了发展生产，医学院里的学生“从正月到六月，每天必须纺三小时的纱”，“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觉得叫这些学生每天花三个小时纺纱是浪费时间的。不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树立好榜样，时间和脑力实在嫌太少，太宝贵了，不应该浪费在这种工作上。”^③后来延安当局听取了福尔曼的意见，取消了医学院学生每天纺纱三小时的规定。

赵超构同样关注延安的生活和思想“标准化”问题，但他对思想标准化有另一番理解。他认为生活决定意识，并不单纯认为群众的思想标准化是受了共产党思想武器的强大压力。赵超构同时指出了“标准化”带来的缺点：“因为摒弃了学院派的学说，延安青年干部赖以求知的途径，只有向经验探索。……这结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狭的思想，并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识的发展”，以及由于忙碌而带来的被剥夺了精神的余裕和生活的趣味。“其意不在批评，而在报道延安生活的一方面，自然，人总是人，在长期的紧张生活中，总免不了感到枯燥单调。单就这点说，我觉得这样的延安生活是

不能给人以满足的。”^④对于党员，赵超构更直白地指出：“据我看来，共产党党员，除了他的党员身份以外，就很少有他个人的身份。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纯粹的政治的动物，那大概就是共产党员了。再详细地说，共产党的最大本领，在乎组织。党员的最大义务，也就是服从组织。”^⑤

对于赵超构所说的“党员身份”，孔昭恺也谈到：中共对军、政与民主团体的领导是绝对的。“党性增强后，个性消失，也为必然事。当然，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增强党员的党性，使其绝对忠实的服务，这种有力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⑥

从以上叙述来看，集体学习、劳动正在成为共产党员、干部以至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非中共人士看来，甚至成为共产党员的唯一社会生活内容，难免有枯燥之嫌。思想意识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由于社会生活逐步趋于一致，思想形态也难免“标准化”起来。延安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形态，已经开始向“标准化”方向发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来，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转向面对第一线的工农士兵，一切服务于抗战，其宣传和动员的功能在当时更大于文艺本身。

四、抗战形势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参观团做了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介绍，并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这篇介绍长达一万五千字左右，但还只是“很简略的说到这里为止”。叶剑英鲜明指出，国内之所以出现数量众多的伪军，“我们

①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第160页。

② 金东平：《延安见闻录》，第156页。

③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④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85页。

⑤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91页。

⑥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15页。

认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不团结、不民主与赏罚颠倒，对全国军民投下一个巨大的暗影，动摇了颇大的一部分军民的胜利信心。”他介绍说，“1943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仍是有加无几，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1943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到我们。”^①

孔昭恺在观察中注意到党对部队的领导。“十八集团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具有权威而且深入的。……中共对它的军队的控制是相当有力的。”^②

外国记者因为更加关注第二战场的开辟，本身又亲自到了前线，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战役。爱泼斯坦从一踏上延安的土地就发现了群众对反击日寇的信心和决心：“充满发奋工作的紧张气氛和对日寇的痛恨；人民决心不顾一切外来干扰，保卫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对盟军对日反攻日益临近的紧迫感，在这未来的反攻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游击队要求最充分的参与并正为此作准备。”^③他的通讯《在敌后》描述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如：游击队对每个据点里敌军情况了如指掌，这些都是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④

外国记者在参观过敌后军民英勇斗争艰苦

建设的现实后曾先后发表谈话。在汾阳前线与参战部队的集会上，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的。”^⑤福尔曼说：“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⑥爱泼斯坦更强调指出，所有对八路军污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⑦在9月21日八分区各界的欢迎晚会上，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的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⑧

五、整体印象

金东平提到：如果诸位要想问一问“延安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我想在我这一段简单的报告里，各位一定可以用自己的看法来找一个答案。这个说法确是有些模棱两可。

参观团在延安逗留三十多天。赵超构对此说得非常客观：“在这短短的时日里，要说深入研究，普遍参观，是万分不够的；要说调查批评，我们更没有如此的狂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记者，我们的立场是采访新闻，我们的

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②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21页。

③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26页。

④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37页。

⑤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

⑥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

⑦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

⑧ 《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

动机只在使我们报纸的读者多知道一些边区的事实。”^①对于边区，赵超构不赞成极端的评价：“我觉得过去我们见到的关于边区的报道，往往免不了有极端的溢美与溢恶。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一种说边区像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两种说法，显然都太夸张。事实是，边区有好的现象，同时也有缺点；而且同一件事，也有好坏两面的发展。”^②

孔昭恺在对比了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和国民党领导的重庆后：“两相对照，我不能不认为共产党搞得更好。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谁好谁来（管理这个国家）！”^③

武道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写有《我从陕北回来》，发表在重庆《大美晚报》。他的主要结论：老百姓生活进步。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土地革命已停止。地主自愿减租减息的政策，正在完满地地进行。……医药设备不够用。……人民都有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我看见了战斗。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④值得一提的是，武道同时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所以他的报道至少不被认为是“亲共派”，那么他观察得出的这几点结论，相对来说更为大众接受与信服。

六、中外记者参观团成行的影响与意义

与世隔绝的延安，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采访和描述，向世人逐步展露其面目。之前外界对共产党和边区最关注的是：政治上，是否专制独裁；经济上，是否凋弊落后；文化上，是否愚昧落后；抗战上，是否在与日军作战。共产党是否值得外界向往和赞赏？第二战场开辟后是否值得援助？通过记者向中国和世界传达的共产党和延安的这些信息，人们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体来看，在描述事实方面，记者们都较为客观地传递了信息。虽然在这些信息背后

透露的含义，各方理解均不相同，但对共产党来说大部分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报道，对延安的正面宣传意义重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⑤可以说，这是共产党非常成功的一次新闻宣传和外交活动。

记者们的作品迅速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赵超构采写的新闻通讯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引起轰动。同年10月，重庆新民报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次年由南京新民报社再版，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数万册。日本也随即翻译出版，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爱泼斯坦在5个月时间里为《纽约时报》发去24篇新闻通讯。1945年4月，以《我访问了延安》（I Visit Yenan）为名出版书籍，由印度孟买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坦因出版《新中国的长城》，198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名字改为《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后中文版名字改为《北行漫记》。

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外国记者由于有“眼见为实”的切身体会，在通讯中进行了着力宣传，并如实报道了八路军在作战中遇到医药、通讯等困难。他们在了解了共产党和边区的实际情况后，纷纷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支持和援助。爱泼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252页。

②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253页。

③ 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2页。

④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3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斯坦坚定地表示：“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①国际媒体也予以报道。美国旧金山电台 1944 年 8 月 3 日晚“美国之呼声”广播中，以 15 分钟时间，报道了美国各著名报纸（如《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示报》等）上所发表的旅延外国记者通讯的摘要，内容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居民一致努力生产，已将贫瘠的地区一变而为繁荣的地区。军队已能自给，不依靠政府和人民的供养。在外国记者所看见的中国军队中，八路军有吃有穿，给养最好。……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已经广泛的实行了民主。^②8 月 31 日旧金山广播驻延安外籍记者的通讯摘要，报道了延安医药界和工业界工程师建立事业的情况，以及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出击克复据点，平毁碉堡，切断敌人交通，解放许多地区与胜利保护麦收的情况。

记者们之后的人生轨迹更是耐人寻味，引

人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超构成为《新民晚报》社长，后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孔昭恺 1986 年以 76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爱泼斯坦 1957 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国民党当局、外国记者、中立媒体和共产党自身，这四种视角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素材，这种共同和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立体、客观地体察 20 世纪 40 年代被蒙上“神秘面纱”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 2010
届博士
责任编辑：赵俊

①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第 27 页。

② 《美国旧金山广播延安近况》，《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8 日。

CCP and Border Area Under Four Perspectives

——Review from Northwest Visiting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in 1944

Wang Caixia

Abstract: In June 1944, northwest visiting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arrived Yan' an with a total of 21 people. Some of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continued their visit to northwestern part of Shanxi in July, and published news reports, press releases and books respectively thereafter. The paper experiences and observes CCP and the border area led by it in 1940s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by focusing on the reports on democracy, people's livelihood, social life and military battles, which the journalists centered their reporting and discussions on.

Keywords: northwest visiting group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CCP; border area